

2025 年中国欧洲学会年会“中欧关系 50 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

潘思舟

时值中欧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50 周年之际，中国欧洲学会 2025 年年会于 10 月 18 日—19 日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隆重举行。本届年会由中国欧洲学会和同济大学共同主办，同济大学德国与欧洲研究院、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上海欧洲学会等单位联合承办。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及智库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青年学子齐聚沪上，共襄盛举。

2025 年既是中欧关系承前启后的“知天命”之年，也是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关键之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美国政策走向持续扰动全球战略稳定，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重塑欧洲政治版图，俄乌冲突的延宕使欧洲安全秩序进退维谷。在此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欧洲对华认知与政策中的竞争性和防范性显著增强，中欧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考验。本次年会以“中欧关系 50 年：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系统梳理双方半个世纪交往的经验与智慧，共同探寻一条超越分歧、相向而行的未来之路，不仅具有厚重的学术价值，而且富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现将本次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开幕式及大会发言

在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欧洲学会荣誉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研究员首先致辞。她指出，中欧关系历经 50 年发展已走向成熟，然而当前所面临的局面之复杂亦属空前。其复杂性不仅源于行为体增多且竞相发声，而且根植于全球经济增长停滞的时代背景，双方共同利益减少，进而深刻改变了中欧关系的议题设置、合作内容与互动方式。周弘强调，研究需“重心下沉”，关注中欧之间 70 多个领域的实质性互动，方能把握全貌。面对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学界需从长周期审视欧洲转型，着力“讨论真问题、真讨论问题”，避免陷入概念与模型的空转。她坚信，尽管短期内存在波折，但中欧文明因差异而相互吸引，从长远看，双边关系必将向前推进。

中国德国友好协会会长，原中国驻德国、奥地利大使史明德从外交实践者的视角出发，对欧洲局势与中欧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他指出，欧洲正陷入战后 80 年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的结构性、系统性危机，其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下降。危机的根源在于欧洲自身，其战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然而，欧洲在战略上日益依附美国，缺乏真正的战略自主。他认为，中欧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

欧洲能否正确认识中国,将中国视为伙伴而非威胁;欧洲能否制定独立自主的对华政策;欧洲能否摒弃“泛安全化”等错误倾向。他强调,合作是相互的,学术研究须从现实而非愿望出发,与时俱进。

中国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伍贻康研究员深情回顾了与中国欧洲学会及欧洲研究事业近60年的不解情缘。作为该领域的开创者之一,他亲历并推动了国内欧洲一体化研究的起步发展。他在分享最新思考时指出,欧洲的起源根植于地缘政治学,其一体化进程同样受困于地缘政治学。欧盟无休止的扩大已使其经济一体化难以为继,安全与政治问题更成为一体化的巨大障碍。最后,他表达了对学界后辈的殷切期望,并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欧洲研究事业。

中国欧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研究员对与会者表示热烈欢迎与衷心感谢。他指出,中欧关系正步入一个“历史性的重构时期”,该时期可能伴随冲突与困难。中国始终坚持合作共赢,但必要时也需进行斗争与反制。他判断,2025年或将成为欧洲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后的“又一个元年”。欧洲在战后80年来首次同时面临与俄罗斯敌对、与美国关系充满不确定性的困境,迫使其“告别后现代、迎接后美国”。在此背景下,他呼吁学界紧密围绕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吕培明教授作为东道主代表,对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坦言,在美国因素产生深刻影响的背景下,如何智慧地处理中欧关系,已成为一项重大挑战。然而,欧洲民间对华交往的渴望与政治层面的冷淡态度

构成明显张力。他强调,同济大学因历史渊源与德国、欧洲联系紧密,学校已设立以德国和欧洲研究为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博士点,未来愿在相关部委的指导下,与学界同仁一道,聚焦欧洲研究重点难点,为国家外交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同济力量。

在主旨演讲环节,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曹蕾系统介绍了当前对欧外交工作。他回顾了2025年中欧高层交往的丰硕成果,指出中欧关系整体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但俄乌冲突和经贸摩擦已成为最突出问题。他分析,欧洲正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实力下降、内顾倾向加剧,导致其对华政策两面性突出,竞争面被放大。面对“时代之变”,他希望学界能加强前瞻性研究,并积极参与对欧交流,讲好中国故事。

商务部欧洲司副处长杨祯一深入分析了中欧经贸关系。她总结了过去50年中欧经贸合作的三大经验:相互尊重与坦诚对话、优势互补与互利合作、妥善处理经贸分歧与践行多边主义。她用“稳中有忧,忧中有机”概括当前态势:“稳”体现在交流频繁、基础稳固、潜力巨大;“忧”则在于欧方竞争力焦虑加重、地缘政治干扰增多、贸易摩擦频发、经贸限制不断严苛。展望未来,她强调合作共赢仍是主流,并建议学界深入研究欧盟经贸决策机制、跟踪其自贸协议网络建设、分析中欧产业合作潜在方向,为中欧经贸合作提供更多智慧支持。

年会开幕式由中国欧洲学会秘书长宋晓敏编审主持。大会发言环节由宋新宁教授主持。

陈新研究员着眼于欧盟投资权能问题,梳理了《里斯本条约》后欧盟投资权能从“中心

化”向“有管理的去中心化”的演变趋势,指出欧委会层面达成的投资协定因批准程序和政治因素无一生效,而成员国层面则发起了大量双边谈判。相较之下,中欧投资协定未能及时更新,绝大多数投资活动仍沿用旧版投资保护协定,无法为日益增长且技术含量更高的中国对欧投资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

丁纯教授围绕欧洲对华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指出,欧洲对华投资正经历“结构性分化”趋势,呈现三大特征:从稳定扩张转为大幅波动,在华欧企数量占比呈下降趋势,投资来源国和行业高度集中。这种态势是中小企业因竞争加剧与地缘政治等压力而普遍“减资”,与大企业为深耕中国市场而持续“增资”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发现,撤资行为对欧企自身的营收、增加值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反噬效应,尤其体现在高新技术企业中。这为中方调整政策吸引欧资提供了重要启示。

崔洪建教授对中欧关系范式进行了理论反思。他提出,过去 50 年主导中欧关系的“合作博弈”逻辑正在转向“非合作博弈”。其动因在于,双方经济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竞争加剧;欧洲对华政治演变的单方面期待落空;国际格局出现各主要力量“相互恃强又相互看衰”的同构化趋势。他认为,当前欧洲将经贸摩擦“安全化”和“政治化”的趋势日益凸显,削弱了中欧关系的韧性。面对变局,学界应超越“竞合”思维,客观把握欧洲“变”与“乱”的两面性,致力于构建自主知识与话语体系,推动国际政治格局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邓翔教授系统评析了旨在重振欧洲竞争力的《德拉吉报告》及后续的“竞争力指南针计

划”。他指出,该报告继承了欧盟绿色与数字转型路径,并试图通过巨额投资和系统性改革解决创新乏力、对美过度依赖及安全焦虑问题。然而,报告执行进展缓慢。其困境在于:战略上坚持不切实际的技术赶超路线,而非将新技术与传统制造业优势相结合;制度上的过度规制抑制了创新动力;根本症结在于人口老龄化、高福利制度及年轻一代价值观变迁导致的内生动力不足。他建议,欧盟可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在成员国层面寻求突破。

二 欧洲政治与社会

本分论坛聚焦欧洲政治右转、民粹主义崛起、政党政治变迁、欧盟治理及社会文化冲突等议题。学者们从政治思潮、媒介生态、政党转型、公共政策及性别政治等视角,深入剖析了欧洲面临的多重危机与一体化困境,探讨了右翼力量的跨国联动、欧盟机构的权力演变以及社会政策背后的身份认同博弈。论坛由王学玉教授和张海洋副编审主持。

欧洲政治右转的深层逻辑与历史脉络成为讨论的焦点。李济时教授基于政治变迁的长波理论,分析了欧洲政治右转的长期趋势与整体特征。他指出,在西方面临深层社会矛盾的背景下,极右力量的主流化趋势可能重构欧洲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动能。尽管面临左翼力量反推与右翼内部分化的制约,但右翼政党在法国、英国等国执政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其影响具有历史延续性。这一右转态势或将重塑欧盟并影响其未来议程。王传兴教授从思想史维度剖析了德国新右翼的源流与特征,指出其根植于柏克、迈斯特的保守主义传统,并通过历史修正主义

与剥离纳粹主义实现主流化,在反移民、反一体化与反美主义中构建政治主张。他指出,2025 年选择党在北威州选举的历史性突破对德国新右翼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其影响力从东部地区向西部蔓延。贺之杲副研究员聚焦欧洲政治思潮与一体化的互动关系。他强调,欧洲一体化历来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典型实践,其理论构建长期由经济逻辑主导,但社会思潮与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欧洲一体化正与社会思潮、政党政治及制度设计联动,并面临美欧思潮联动及内部高福利时代终结等挑战。尽管如此,欧洲一体化仍在夹缝中展现出韧性。

与会学者还深入探讨了成员国政治格局和欧美右翼联动的演变规律。王弘毅副教授探讨了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右转的社会根源。他指出,中东欧因与西欧相异的历史传统而成为右翼思潮的中心,其政治生态的右转根植于社会传统之中。他提出了传统主义与政党政治右转的互动逻辑框架,指出政党的动员机制包括以“为传统而战”为旗帜,重构上帝、历史、民族、家庭、社会五大核心要素的传统秩序;通过历史政治化和记忆建构塑造悲情叙事;推动宗教的民族化与民族的神圣化;强调基于天主教文明的传统家庭秩序。杨云珍副教授系统梳理了“特朗普 2.0 时代”欧洲极右翼政党的现状与影响,指出极右翼政党将经历四个阶段而日趋主流化。虽然欧洲三大极右翼政党尚未形成统一的对外政策,但传统主流政党式微、政治个人化与碎片化的趋势正日益加剧。玄理博士聚焦“特朗普 2.0 时代”欧美右翼多层次互动问题,指出民族保守主义融合保守与传统价值观,新阶层精英以反自由主义霸权与西方文明联盟建

构共同敌人,通过网络平台推动议题联动和选举勾连,构建保守主义思想与话语体系并培植保守主义新生代。跨大西洋右翼合作虽面临内部分歧与机制化不足因素的制约,但仍有可能重塑国际秩序。臧术美副研究员以法国政治格局演变为范本,剖析了中间派崛起与政党制度危机,将第五共和国划分为戴高乐集权、左右两极、多极化多党制及马克龙例外四个阶段,指出马克龙凭借个人魅力、民众厌旧情绪以及美国社会危机异军突起。左右轮替与多极化趋势没有改变三足鼎立的局面,但由于法国选举制度的约束机制和民众警觉性,其治理危机的出路仍不明朗。王耀辉以英美右翼政党为例,分析了改革党与共和党的政治联动机制,指出两国的右翼党派合作是以共通的政策主张为基础、以关键角色互动为主线、以右翼运动平台构建为形式的深度政治联动。两党基于反移民、贸易保护主义与文化战争等政策共识,通过民粹领袖战略合作、精英资源互通与利益集团合作构建深度同盟,并推动保守主义平台的发展。

在危机驱动下,欧盟机构权力扩张与政策转型加速,其对中欧关系的潜在冲击值得警惕。门镜教授以公共卫生领域为例,分析了冯德莱恩时代欧委会的权力扩张逻辑。新冠疫情暴露了欧盟在公共卫生领域缺乏中央协调机制的弱点,欧委会通过建立健康联盟与卫生应急准备和响应机构,将危机应对机制常态化,并集中了相关决策权。尽管疫苗采购丑闻暴露了民主监督缺失的困境,但欧委会通过合法性重构与议题政治化重塑欧盟权力结构。未来,若出现强势主席与弱势委员会并存的情形,欧盟机构集权的趋势可能持续扩展。忻华研究员从供应链

地缘政治视角评析欧盟关键原材料战略,指出其源于中美欧技术经济竞争与竞争力、韧性、资源的三重焦虑,战略涵盖总体经济、产业政策、对外经济与外交四个层次,旨在通过进口替代与产能内化提升自主性。然而,竞争政策并未发生实质性松动,对华依赖减少可能加剧投资审查与贸易摩擦,中欧经济关系面临更大压力。张锐副研究员通过构建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化叙事框架,并以 2020—2024 年文本为依据,揭示欧盟通过原材料安全、供应链主导、地缘政治安全与关系网络四类叙事将清洁能源建构为竞争议题。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呈现与传统能源相似的阵营竞逐,中欧昔日互补领域因中国技术赶超与欧洲认知转向,合作前景趋于复杂。唐耀卓分析了欧盟重新武装的战略逻辑与前景,指出其安全观正从“繁荣安全”向“战前时期”发生转变,俄罗斯对自身生存的威胁、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共同驱动防务联盟的建设。在短期援乌、中期备战、长期构建欧洲防务联盟的三阶目标下,欧盟试图推进军事一体化,安全或取代经济成为一体化的新动力。

学者还对媒介体制转型与公共叙事博弈、性别政策范式与民粹动员等议题进行了探讨。赵如涵教授分析了欧洲媒介体制的演变趋势,指出公共服务广播面临收视率与信任危机,平台化重塑传播逻辑并加剧美国文化霸权。为应对挑战,欧盟将视听法规从市场导向转为价值导向,强调保障传播主权,但因成员国差异,政策执行率低下。梁雪村副教授探讨了新右翼对女性的政治动员机制,指出 2017 年后女性投票右转趋势突破传统性别角色假设,网络女性主义通过个人叙事与创伤表达解构进步主义话

语,虚拟社区弥补女性线下参与不足的困境。民族主义情感诉求与道德经济规则诉求有效吸引女性,通过强调公平以对抗优绩主义。柳静虹副教授基于法国公共政策认知与性别表演理论,分析了女性主义发展政策的范式变迁,指出其从 20 世纪 70 年代“女性融入发展”的功利主义转向 80 年代“性别与发展”的解放式赋权,但在新自由主义的裹挟下演变为一种聚焦个体而非结构性改革的自由主义赋权模式。在此过程中,政策认知的伦理性与政治性维度在塑造女性主体时,也引发了反性别运动的全球回潮,呈现出女性困境与保守反弹并存的局面。

三 欧洲经济与法律

本分论坛聚焦欧洲在经济治理、数字转型、能源安全与绿色新政等领域的最新动态,与会学者就欧盟如何应对内部结构性挑战与外部地缘政治压力进行了深入探讨。论坛由杨逢珉教授和杜莉教授主持。

俄乌冲突深刻重塑了欧盟的能源格局,推动其积极寻求战略自主。刘宏松教授分析了欧盟能源“去风险”政策,指出其在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和保障能源安全方面成效欠佳,并面临成员国分歧、地缘政治风险、资源国主权壁垒及关键矿产博弈劣势等挑战。王偲骁副教授从结构性权力视角审视欧盟能源战略自主,认为其在安全结构上对美依赖、生产结构上受传统能源制约,尽管在金融与知识结构上具有一定优势,但上述四方面间充满矛盾,其难以突破能源依赖。李倩瑗副教授通过对美欧液化天然气贸易的考察,揭示了欧盟能源安全的多重困境:在实现对俄“去风险”的同时,形成了对美的新依

赖,并承受着高昂的经济成本,战略自主目标远未实现。

欧盟在数字领域加速立法,力图通过规则塑造竞争力并实现数字主权。王皓教授探讨了美国《GENIUS 法案》对全球稳定币市场的影响以及欧盟《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MiCA)的应对。他指出,尽管 MiCA 早于美国立法,但欧元稳定币市场占有率极低,且面临严峻挑战。《GENIUS 法案》的出台迫使欧盟重新评估私人稳定币的风险与数字欧元的战略定位,欧元的国际地位面临巨大威胁。张彤教授对欧盟《数据法》进行分析,指出其核心理念已从 GDPR 时代的数据保护转向数据赋能与数据主权,通过数据共享、构建欧洲数据空间等手段提高工业数据价值。然而,该法案面临合规成本高昂、数据定价与补偿机制模糊、与隐私保护间失衡及可能形成全球数字堡垒等挑战。

在绿色与数字化双转型背景下,欧盟如何提升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刘慧教授系统梳理了欧盟通过“欧洲研究区”推动跨国协同创新的治理机制,包括开放式协调、咨询建议与监督机制,以及基金、项目平台等治理工具。尽管在科研设施共享、人员流动与伙伴关系建设上取得进展,但欧盟仍受困于科研投入不足、成员国创新能力失衡及利益相关者参与度较低等难题。宫云牧博士分析了欧盟试图将数据治理中的“布鲁塞尔效应”复制到人工智能监管领域所面临的困境。她指出,相较于静态的《人工智能法案》,技术迭代飞速且竞争激烈,欧盟在技术生态中处于劣势,其“监管先行”的范式正遭遇美国的阻力和中国的压力,且未能引发企业自主追随,迫使欧盟

反思并转向更强调竞争力的“发展先行”模式。

确保供应链安全与关键原材料供应是欧盟经济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寇静娜副教授对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的实施前景表示悲观。她指出,欧盟在关键矿产领域高度依赖外部,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合作伙伴时,面临来自中国、美国及中东主权基金的激烈竞争。欧盟内部因公共资金不足与私营部门投资犹豫而陷入“互相埋怨”的困境,战略落地缺乏资金支持与实际行动。刁莉教授从农产品贸易视角切入,分析了俄乌冲突对欧盟粮食安全的冲击。她指出,冲突导致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受阻、价格攀升,欧盟虽通过免税等措施支持乌克兰出口,但自身农产品价格被推至高位。战争的延宕使欧盟面临寻找替代伙伴、平衡短期应急与长期供应链弹性方面的严峻考验。

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引发的贸易政策变化,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了复杂影响。董一凡副研究员分析了欧盟竞争力战略的转型路径,指出在焦虑加深的背景下,欧盟正从警惕国家干预转向强化产业政策、重塑单一市场,但其政策受到内部利益协调困难等因素的制约。何樱灏博士梳理了美欧关税协定的演变进程,指出欧盟的妥协虽暂时稳定了美欧经贸关系,但强化了美国联合盟友进行对华施压的态势。然而,谈判过程中,中欧在电动车等领域探索出的“价格承诺”等替代性安排,可能为未来解决双边贸易摩擦提供新的范式。苏静博士从地位理论出发,认为欧盟在谈判中对内(强调伙伴关系)与对外(展示强硬反制)释放的矛盾信号,导致其国际地位呈现出下降态势,反映了欧盟在平衡跨大西洋关系和自身核心利益间的艰难

处境。

欧盟日益增多的监管措施对在欧中资企业构成现实挑战。刘凡博士基于在希腊的实地调研,揭示了中资企业运营面临的政治社会风险。她发现,中资企业正从“承建型”向“控股+技术+运营”的复合型模式转变,并开始通过设立公关部门、加强社区融入等策略积极应对。党和苹博士深入剖析了欧盟《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指出其以人权和环境保护为由,将域外管辖从自愿遵守和分行业推行模式,转变为全行业的强制性要求。她分析了欧盟如何通过引用联合国法源、宣称代表“全球南方”利益来构建其合法性,但其监管方式的理论基础与执行力仍存在巨大争议。

欧盟推进绿色转型的具体政策工具及其协同机制也受到学者重视。樊文静副教授指出,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对中国化工、金属制品等隐含碳高的行业利润造成严重挤压。然而,国内过半出口企业对CBAM认识不清,虽多数已采取减排措施,但受技术、资金和政策认知所限,减排效果不理想。刘夏副教授对中德专利开放许可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她发现,中国的制度设计更为谨慎,导致企业参与度低、开放专利价值有限。与德国相比,中国在激励力度和配套服务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四 欧洲外交与安全

本分论坛聚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欧洲战略定位、安全架构转型及其对外关系,与会学者从理论、政策等层面,深入探讨了欧洲在面临地缘政治竞争、跨大西洋关系波动与内部治理挑战时的战略选择与困境。论坛由赵晨研究

员和于文杰教授主持。

面对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学者们对欧洲在世界中的角色与战略定位进行了宏观审视。王义桅教授提出了欧洲研究的十大范式转移,主张应超越传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工业文明逻辑,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审视欧洲。他指出,欧洲的“平等有序”观基于一神论传统,与中国倡导的“包容性多极化”存在根本差异,研究欧洲的意义在于汲取其经验教训以塑造未来世界。张骥教授指出,在大国竞争加剧、文明冲突日益严峻的大变局下,欧洲试图从经济行为体向安全与地缘政治行为体转型。他认为,欧洲作为规范性力量、东西方桥梁及多元主义倡导者的根基正在松动,加之其现代化模式吸引力减弱与社会模式面临危机,其整体战略地位呈现下降趋势。

欧盟战略自主的实现路径与内在韧性是讨论的焦点。宋黎磊教授追溯了欧盟战略自主从概念到制度化的演进过程,指出特朗普上任与俄乌冲突构成两个关键节点,推动欧盟在防务机制建设方面取得进展。战略自主正通过E5俱乐部等小多边形式从理念走向制度安排,并可能成为欧盟的长期指导思想。赵健哲博士引入“韧性”概念,分析了欧盟在应对新一轮跨大西洋冲击时的安全与发展政策。他指出,欧盟通过在防务领域推进永久结构性合作与提升军工自主性,在经济领域构建“复苏与韧性促进机制”推动绿色与数字转型。然而,成员国在对美国认知上的差异,使其在适应冲击与构建新常态方面仍面临目标不清的挑战。

学者们围绕欧洲实现独立防务的雄心与结构性障碍进行了深入辨析。杨海峰副研究员解

读了欧盟提出的“从美国治下和平到欧洲治下和平”这一战略愿景。他认为,该构想以德法合作为轴心,旨在建立真正的防务联盟与北约的欧洲支柱。尽管欧盟已规划高达 8000 亿欧元的防务基金并出台系列文件,但其实现面临成员国分歧、美国对欧洲购买其武器的施压等挑战。薛晨副研究员强调,欧洲存在在军事装备、核保护伞乃至数字领域对美国的深度依赖,以及内部因政治极化和法德轴心引发的信任危机等现实困境。他认为,最有效的发展路径是在外部压力下增强防御能力,但这无法改变其对美国的依赖。

特朗普重返白宫带来的跨大西洋关系变化引发深入探讨。方炯升副研究员从历史视角审视了“特朗普冲击”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他回顾了美国在政治支持、经济援助与精英互动层面对欧洲一体化的推动作用,及其背后的战略限制。特朗普时代对上述三方面的冲击,旨在“锁定”“拿捏”并按照右翼世界观“改造”欧盟,而欧盟的应对呈现出以“调试”与“自强”为主的偏软态势。严少华副研究员分析了美欧右翼联动的三大新趋势:互动网络日趋机制化、硅谷科技精英影响力上升,以及“文化战争”的全面升级。尽管存在共同保守价值观与相互借力的诉求,但美国优先与欧洲优先的内在冲突、美欧右翼实力不对称以及欧洲右翼的高度分化,制约了所谓“新跨大西洋联盟”的形成。

安全理念的差异与对外战略的调整成为重要议题。张迎红研究员比较了中欧安全观的异同。双方对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安全挑战上升的判断相似,且在坚持联合国的核心作用方面存在共识。分歧在于欧盟对华负面认知加

剧,将中国视为继俄罗斯之后的第二个主要威胁来源;双方对多极化影响的判断相反,对多边主义的实施路径也存在明显差异。姜胤安副研究员聚焦于欧盟与韩国的战略接近,认为这种基于价值观同盟的合作已超越传统经贸范畴,延伸至政治、数字与关键原材料供应,以及安全防务领域。这一动向既是俄乌冲突后地缘政治传导的结果,也体现了欧韩在对俄军事焦虑、印太经济布局及对华“去风险”方面的共同需求。

区域安全架构的变化对欧洲产生了差异化影响。杨博文博士分析了威胁认知上升和安全结构转型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俄乌冲突使欧盟对俄威胁认知固化,推动安全架构转向“排俄化”。身处前线、兼具道德优势与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中东欧国家,其内外政策受到深刻影响:国内政治极化加剧、在欧盟内安全话语权上升,以及与美欧间的协同性上升。黄昆则基于战略稳定理论视角,提出了德国外交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时刻”这一分析框架,用以描述当前德国面临的“弱威慑—低互信”安全困境。施密特总理通过威慑与谈判并行的策略应对中导危机的历史,为德国在美俄中导部署再度成为焦点的背景下,如何从“风险升级区”走向“军事稳定区”提供了镜鉴。

五 中欧关系

本分论坛围绕建交 50 周年的中欧关系进行探讨,学者从地缘政治、经贸科技、人文交流及安全防务等维度,分析了当前双边关系面临的挑战、存在的认知错位以及未来可能的路径选择。论坛由孔田平研究员和钱运春教授主持。

学者们从宏观视角剖析了欧盟的内部转型及其对中欧关系的战略性影响。朱贵昌教授系统分析了欧盟的“地缘政治化转向”,指出其已从话语塑造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表现为地缘政治思维回归、身份认知向地缘政治力量转变,以及政策实践上的安全化和武器化倾向。他认为,这一转向将固化欧盟对华“制度型对手”的认知,加剧竞争压力,并使中欧地缘政治冲突风险上升。宋鲁郑研究员基于一线观察认为,欧洲在俄乌冲突立场、经济竞争、地缘政治扩张及对欧外交从属于对美外交四个层面对华不满。欧洲当前深陷与俄、美、中三方关系同时紧张的地缘政治孤立困境,却未能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潜在价值。当前是欧洲调整对华战略的“最后、最有利时机”,但欧洲反应迟滞,致使中欧关系难以改善。与之形成对照,赵柯副教授概括了 2025 年中欧关系呈现的“三个落差”,包括预期改善未能实现、欧美关系恶化未带动中欧关系改善、峰会氛围未软化欧方基调;“三个错位”,包括中方重经贸合作与欧方重安全诉求、中方视欧方为伙伴与欧方视中方为竞争者、双方对欧方行为是“追随美国”还是“自主选择”的理解差异。在中美为当前主要矛盾的框架下,应对中欧关系寻求政治上的边际改善。段挺副教授梳理了中欧防务关系从冷战时期的“互不理睬”,到 1999 年炸馆事件后互访增多,继而建立政治磋商、安全对话等机制化交流的历程。他指出,这一关系在 2019 年北约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后发生历史性转变,机制对话中断。与此同时,北约加强与亚太盟友的联动,欧洲舰机在亚太活动显著增加。此举既有欧亚安全关联叙事与配合美国印太战略

的需要,也包含欧洲维护自身经贸生命线的考量。

与会学者深入分析了中欧在经贸和技术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态势。林力副教授通过梳理近 30 年的贸易数据,展示了中欧贸易结构从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中国出口优势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品演进的历史脉络。她指出,当前的研究热点已从“合作”“欧元”转变为“竞争性”“贸易失衡”乃至“博弈”,反映了双方经贸关系性质的深刻变化。严天钦副教授分析了欧盟对华“去风险”战略的动因与影响,认为其是实力变化、内部危机、身份认同挑战及外部事件共同驱动的结果。他指出,欧盟通过制度建设、多边平台合围,以及关键技术安全与供应链突围,构建了全政府联动遏压体系,导致中欧摩擦增多,未来关系破局艰难。张超副研究员聚焦欧盟“全球门户”倡议与中欧“互联互通”倡议的竞合关系,指出“全球门户”倡议面临成员国参与度不高、发展中国家兴趣减弱及欧美协调停滞等障碍。在欧方将“全球门户”定位为对华竞争工具,且缺乏政治互信的背景下,中欧两大倡议对接合作虽潜力巨大但缺乏现实操作性。游楠副教授追踪了欧洲议会对“一带一路”认知的变迁轨迹,发现其从初期的“战略观望”经“制度性疑虑”,演变为“选择性接触”和当前“危机驱动下的选择调整”。她指出,这一认知演变受地缘竞争、制度压力、利益权衡与身份重构四重机制的驱动,致使对华合作面临制度壁垒显性化、第三方市场竞争白热化等挑战。

学者们还从机构权力演变和相关领域互动视角切入,进行微观层面的洞察。钟艺琛博士

分析了欧盟委员会的政治化、总统化与集中化的多维转型趋势,揭示了其如何从一个技术官僚机构转变为能对中欧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与安全行为体。他指出,欧盟在对华政策上“不寻求照搬法国印太战略”“不寻求加入美国同盟体系”,但也“不寻求在中美间中立”。顾苏博士以芯片产业为例,分析了欧盟如何通过“集体安全化”进程,将经济和产业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进而实现了政策基调从全球化理念到技术主权与产业安全的转向。她指出,以德国和荷兰为代表的成员国在安全逻辑与市场规则间的差异取向,可能成为中欧技术合作的潜在空间。陈婉玉博士比较了中欧在数字主权领域的认知差异:欧盟侧重个人权利优先与规则先行,旨在输出规范;中国则强调国家发展与安全优先,以及试点先行,主张主权平等。她认为,双方在反对数字霸权、人工智能治理、绿色数字转型、跨境数据安全及平台监管方面存在合作空间,但受中美博弈、中欧内部制度和信任赤字,以及合作机制脆弱等因素的制约。

在充满挑战的背景下,人文交流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受到关注。吴侨玲教授强调了人文交流的基石作用。她指出,尽管双边政治氛围紧张,但青年交流与民间往来可以有效消除误解。她呼吁双方相向而行,坚信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仍可发挥“压舱石”作用,并对中欧关系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邢慧斌教授展示了中欧旅游合作逆势发展的积极图景,指出中国出境欧盟订单量增长超 30%,签证便利、直航恢复、中文服务及移动支付普及是主要动力。欧盟入境中国旅游模式正向“散客化、个性化、深度化”转变,并预测双向旅游交流将继续深

化,为促进经济、就业与文化交流发挥独特作用。赖雪仪副教授通过对中欧官方社交媒体账号的对比分析,发现在 2025 年 7 月峰会期间,欧盟驻华使团发布内容中关于峰会的比例远高于中国驻欧盟使团,可能意味着欧方对中欧关系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欧盟在叙事中持续将中欧关系“政治化”并关联俄乌冲突,而中方则努力规避这一趋势,更多展示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

六 区域与国别

本分论坛的学者们从外交战略、经济政策、内政变化、教育革新及社会文化等主题切入,运用多样化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对德国、西班牙、英国及中东欧等国家与地区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论坛由赵怀普教授和李靖堃研究员主持。

在外交与安全战略领域,多位学者分析了主要欧洲国家对国际新形势的应对与选择。伍慧萍教授系统分析了德国在欧洲发挥领导力的雄心及其面临的局限性,强调默茨政府上台后积极展现外交能动性,努力打造欧盟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并提升防务开支,力图依托德国经济实力和欧盟的制度资源提升其领导作用。然而,军事实力不足、欧盟决策机制掣肘、国内执政联盟脆弱及民众态度分化等因素,限制了其领导力的有效发挥。杨解朴研究员引入“嵌入式建构”理论,分析德国新政府对欧、对美、对华关系路径,指出德国倾向于通过制度塑造与规范输出影响区域和全球秩序走向,在对欧政策上推进欧盟对外决策机制改革、增强欧盟的行动能力与推进欧盟战略自主,在对美关系上协

调跨大西洋利益摩擦,在对华政策上采取防范与合作的双重策略,尝试以规则为基础嵌套中国进入欧洲中心框架,从而在全球秩序中拓展影响力。然而,受制于美国多变性、欧洲内部分歧及自身能力短板,其建构进程充满不确定性。张敏研究员分析了国际新形势下西班牙的外交政策走向,指出尽管面临联合政府执政、内政基础相对脆弱的挑战,西班牙仍凭借经济增长与欧盟层面的基金支持,推动绿色数字化转型。在外交层面,西班牙坚持主权底线并积极深化对华合作,通过高层引领、平台搭建以及关键领域精准引资发挥桥梁作用,体现了务实与主动性。中西关系由此开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具有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战略定力。

在经济与财政政策主题下,学者们重点关注了结构转型与投资挑战。朱宇方博士盘点了默茨政府的经济政策,重点分析了 5000 亿欧元基础设施与气候保护专项基金的雄心,指出德国经济疲软源于结构性问题,但该投资计划面临劳动力短缺、行业产能瓶颈引发通胀、投资和负债缺乏有效性等挑战,实际效果可能受限,反映了默茨新政府在多重危机背景下的投资难题。因此,需审慎评估政策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胡春春副教授以国家叙事和多重危机为视角剖析德国现状,指出 2025 年德国在政治上面临右翼选择党崛起与对外政策失语的困境,经济上表现为增长乏力与投资承诺虚实交织,社会上呈现出移民政策收紧与社会福利承压之间的矛盾。然而,德国对于上述困境的态度与其战后的国家叙事形成强烈对比,需从社会学层面理解多重危机的复合影响。

学者们还重点讨论了欧洲右翼力量的崛

起、叙事策略及其影响。李正东副研究员分析了德国选择党的政治转向与民粹主义危机叙事逻辑,指出其崛起根植于两德统一后,东德地区因强制并轨而产生的经济和文化疏离感。选择党的话语重心已经从反欧盟精英主义转向反移民民粹主义。然而,作为体制内反建制政党,其面临组织悖论:动员能力随体制化进程而削弱,体现了其从社会运动型政党向制度型政党转变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冯颖懿博士研究了德国选择党在社交媒体上的排外主义图像策略,发现其使用贫困老人、难民潮、蒙面恐怖分子等视觉符号,通过情感共鸣与匿名化强化“我们—他们”之间的对立,将移民塑造为资源竞争者和安全威胁者,从而操纵民众情绪、传播仇外意识形态。这种图像叙事延续了欧洲文化偏见,加剧了社会撕裂,凸显了视觉政治在民粹主义传播中的关键作用。陈金博士分析了英国改革党的转型与影响,指出其从脱欧党转向多议题专业化政党的趋势。在 2024 年大选和地方选举中,该党分流保守党选票、吸纳资深党员,加剧政党碎片化,并可能成为未来大选中的一匹黑马。该党部分政策和话语模式模仿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且与英美右翼政客之间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体现了美国政治力量对于改革党的政治背书。为应对跨大西洋右翼之间的联动,工党政府已在外交政策方面调整英美关系与移民政策。

在社会文化与身份政治领域,学者们进行了批判性与比较性分析。陈昕彤副教授剖析了欧洲移民政策中公民整合主义的文化表意,指出其以公民身份替代多元文化主义,通过入籍考试、誓词仪式等符号文本,将移民隐喻为学生

或低认知者,实则植入文化等级观念,排斥非西方价值观。这种政策揭示了自由主义身份认同背后的文化歧视与权力运作,为理解欧洲移民整合的深层矛盾提供批判框架。徐晓红博士探讨了苏格兰地区的多元文化主义,指出其基于人口增长依赖、老龄化压力与族裔多元化的现状,通过权力下放后政策制度化与公民民族主义构建认同来彰显特色。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既是应对人口危机的务实选择,也是强化地区认同、消解主权国家主体的工具,但在中央政策制约下效果有限,从而为欧洲移民整合提供反思样本。杨策探讨了工具性本体安全驱动下的中东欧防御性疑欧主义,并以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及匈牙利青民盟为例,指出两党利用历史记忆和现实发展落差制造焦虑,将欧盟建构为自由主义他者;通过反移民立法等策略强化民族认同,巩固国内权力。这种高度工具化的政治策略是疑欧主义的谈判筹码,体现了中东欧国家通过强调与欧盟的价值观差异维系本体安全的意图。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靳倩倩博士比较了欧盟《数字服务法》与中国《网络安全法》在治理理念、监管机制与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异同,指出欧盟侧重去中心化协同与多语种平等,双方在抵御美国话语霸权与极端言论上存在合作空间。然而,受制度差异与数据获取限制,需构建去美国中心化的国际话语体系,语言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维度正成为中欧竞合的新场域。吴梦徽博士探讨了德国数字教育治理中的新行为体与新秩序,指出在数字化与联邦制张力下,中介化治理通过政府背书平台、市场机构、科研组织与教师社群等行为体重塑教育网络。权力资

源沿结构协调者、知识转译者和价值协调者节点流动,形成多中心治理结构,但也带来问责缺失、理念冲突与合法性危机等困境。

七 大会发言与闭幕式

10月19日上午的大会发言环节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主持。戴炳然教授从竞合视角审视了中欧关系50年的演变。他指出,经贸关系作为中欧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并未改变,但双方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发展差距缩小导致产品与市场出现全方位竞争。与此同时,政治因素对经贸关系的干扰上升,国际经济秩序遭到发达国家破坏,呈现板块化趋势。在政治领域,中欧双方虽拥有和平发展、多极化等共同目标,但具体诉求与方式存在根本差异,地缘政治缓冲余地减小,意识形态鸿沟难以跨越,加之第三方因素干扰,使得政治关系面临严峻挑战。面对竞争常态化的新现实,中国应着力做大自身比较优势,以市场求合作,在政治上求同存异,寻求相互理解,并对欧美采取差异化策略。

徐明棋研究员深入剖析了中欧经贸关系面临的历史性挑战。他指出,在中欧建交50周年的关键节点,双方互信却因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而遭遇严峻挑战。经贸合作中搁置意识形态与制度差异的共识已被打破,欧盟对华政策显著转向,强调竞争与管控风险,合作共赢不再是首要导向。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引发欧盟心态变化、美国对华政策日趋敌对、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以及欧盟内部保守主义势力抬头。

冯绍雷教授分享了阿拉斯加峰会前后对大国互动的观察与思考。结合普京总统对阿拉斯

加会谈的评价,他认为此次会谈在俄乌冲突的解决方案上可能取得了未公开的进展,其共识在后续动荡中依然发挥作用。他特别提到,中方领导人曾向俄方表示,乐见俄美关系正常化,并愿提供必要协助。这一立场既符合中国利益与全球发展需求,也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相一致,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稳定大国关系方面的建设性角色。

吴志成教授系统论述了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中美欧三边关系。他指出,全球南方兴起与美国内部分化共同塑造了百年变局,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对世界贸易、大国关系、全球治理和政治思潮造成多重冲击。在中美进入战略相持的背景下,中美欧不等边三角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欧盟对华“系统性对手”和“竞争者”定位凸显。他将中美战略博弈划分为 2035 年前的“积极防御”、2035 年后的“相持竞争”及远期的“政治长跑”三个阶段,强调不同阶段的重心与博弈强度各异。他提醒,欧盟的“去风险”在目标、手段和灵活性上与美国对华打压存在差异,中方应重视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战略平衡作用,精准回应欧方核心关切,尽力争取欧洲,避免同时失去欧美两大市场。

郑春荣教授聚焦于欧盟的“全球南方”政策调整及中国应对。他首先分享了对中美欧三角关系的观察,指出欧洲学者近来坦承其对美国的依附性,欧盟的政策选择与中欧关系的结构性困境致使美欧关系疏离但未能转化为中欧关系的实质性走近。随后,他系统梳理了欧盟在全球南方政策上的调整:在贸易投资领域通过自贸协定和“全球门户”倡议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服务于对华“去风险”战略;在发展援助

领域注重利益导向并与地缘政治目标相捆绑;在国际秩序塑造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采取选择性合作与分化的策略。中国应破解欧盟分化全球南方的意图,强调自身作为全球南方天然成员的属性,推动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并探索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能性。

田德文研究员探讨了在数字绿色转型背景下维护中欧创新伙伴关系的路径。他引入“选择性嵌套合作”理论,指出尽管高层政治踟蹰不前,但中欧在电池联盟、可信的人工智能、碳足迹互认等领域的创新合作仍在进行,并形成了“高层原则—中层领域—下层沙盒”的稳定结构。这种结构使得退出合作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与时间,从而为合作提供了韧性。他以宁德时代与巴斯夫的可持续电池价值链合作、中欧绿氢共研与碳市场对话为例,说明底层项目的共同利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高层政治波动。未来中欧合作应更加注重自下而上的推动,通过夯实基层项目合作反向影响高层决策。

成新轩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对中欧产业链贸易的影响。她指出,中国已在中欧电动汽车产业链的中游环节取得主导地位,合作模式从双向互补向中国供给主导转变,使得中欧在电动汽车产业链上形成结构性竞争关系。通过对欧盟成员国投票行为的分析,她揭示了其内部因产业关联差异而立场分化的现象。欧盟单方面加征关税或中欧发生贸易摩擦将导致双输局面,而合作则能提升双方产业竞争力。在高度全球化的产业中,贸易壁垒只会引发贸易转移,中国应坚持自由贸易,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构建替代

性合作网络。

段德敏研究员分析了欧盟北方(北爱尔兰边界)、东方(扩张与“帝国化”)和南方(移民危机)边疆地带的治理困境与身份张力。北部边疆问题揭示了英国脱欧后边缘化的困境;东部扩张暴露了欧盟在推行“规范权力”时的“帝国化”倾向及其在价值观外交与现实干预之间的矛盾处境;南部移民危机则体现了欧盟内外有别的“城堡”心态及其政策的前后矛盾性。他认为,欧盟自我定位混杂了“后现代”的规范诉求与“前现代”的文明等级观念,其本质上是一个“纸糊的帝国”,战略上依附于美国,而非真正独立的强大政治实体。

闫瑾副教授系统阐述了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盟对台政策走向。她指出,欧盟对台政策已从“依附性议题”升级为“印太战略独立性议题”,其发展逻辑从“利益克制”转向“冲突催化”。当前欧盟对台政策呈现出安全化、价值化与联动化三大特征。其背后是三重困境:安全认知谬误、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权衡失当、多层治理协同失灵。展望未来,她认为欧盟对台政策将维持有限介入的基调,但中长期看,中欧在投资协定、气候能源转型等领域的共同利益,可能成为缓解分歧的制度缓冲器。

在小组汇报环节中,玄理博士、王偲骁副教授、方炯升副研究员、赵柯副教授和黄萌萌副研究员分别对五个分论坛的讨论情况做了总结汇报。

闭幕式由中国欧洲学会副秘书长、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主持。中国欧

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研究员致闭幕词。他对同济大学及会务团队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并充分肯定了本次年会在交流观点、激发思考、传承学术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结合会议讨论,冯仲平进一步阐述了欧洲正在经历的三大深刻变化:从主动的世界塑造者转变为被动的应变者;战略重心向安全领域倾斜;政治生态右转导致内顾与保守倾向加剧。基于此,他对中欧关系提出三点判断:一是应客观看待,避免盲目乐观或过度悲观;二是经济合作与全球治理仍是需着力巩固的两大支柱;三是俄乌冲突与中美博弈构成影响中欧关系的两大外部约束性因素。学界应继续深入研究欧洲,客观评估其力量,努力影响其认知,防止中欧关系“中美化”。

郑春荣教授在总结发言中再次代表承办方向中国欧洲学会的信任、各位与会专家的精彩分享,以及会务团队的周到服务表示诚挚感谢。他期待以此次年会为新的起点,学界同仁能够继续为推动中国欧洲研究事业和促进中欧关系健康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本届年会主题鲜明、视野宏阔、讨论深入,既有对 50 年中欧关系历程的深情回望,也有对当下复杂挑战的冷静剖析,更包含对未来合作路径的理性展望。会议集中展现了中国欧洲学界立足国家战略需求、秉持学术自主意识、致力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最新探索与丰硕成果。

(作者简介:潘思舟,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博士后;责任编辑:齐天骄)